

巴人文化探究

—兼谈古代巴中建国之考辨

喻汉文

国家昌明，必然伴之以文艺复兴，而生活在远古巴人栖息繁衍并创造了悠久历史与文明地方的今人，也必然要对先民巴人加以研究。远古巴人以惊人的毅力与智慧，创造了许多奇迹，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。这就引起无数古人与今人、巴人与非巴人倾力研究。撰者在机缘巧合下，曾多年接触与研究巴人文化，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，不但发现巴人的发祥地在巴山，更发现巴中在古代曾有建国的痕迹。于是按此思维，从那些大量而零散的史料与典籍中去稽考查找，终于找到了许多强有力的建国依据。现将稽研结果，联缀成文，言辞谫陋，诚请指赐。

一、远古巴人来历与迁徙

（一）远古巴人的来历

据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载：“西南有巴国。太皞（即伏羲）生咸鸟，咸鸟生乘厘，乘厘生后昭，后昭是始为巴人”，故巴人为伏羲之后。古人惜墨如金，从中原角度讲，“西南”指秦巴山地之南，其主体为巴中地区（除今巴中辖区外，还包括汉中东部和万源西部）。

传说，后昭兄妹二人，带上伏羲八卦（《连山易》），率

领族人沿黄河古道西行，不畏山高与水险、虎豹与蟒蛇、酷热与严寒、忍饥受饿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到达青海东部，与西王母部族相互交流了语言、象形文字并传授了八卦。在西王母部族指引下，巴族分成两队向青海南端进发，终于在黄河与长江源头之间，找到了盐岩山，完成了先辈探天之梦。

圆什么梦呢？从到达目的地看，应指的是盐。远古之时，人间有了火，才吃起熟食，可还是少滋味，身上照样长着毛，传说吃了盐方可解决，于是才有此西行。

后昭兄妹及族人在返回途中，天降滂沱、洪水泛滥，所幸，兄妹乘坐树筏随着洪水一路漂流，后被大巴山挡住，最终活了下来。为繁衍生息，他们以“隔河合磨”“隔河穿针”的天意凿合而结为夫妻，其后就在大巴山繁衍生息。

（二）远古巴人迁徙。又过若干代之后，远古巴人逐渐增多，为生活与发展需要，便向外扩张迁徙。其时由于交通工具不发达，自古“欺山莫欺水”，于是逢山开道，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外，大部分人分别向东与南迁徙：向南者，翻过大巴山经米仓道进入巴州地界进行开发；向东者，又分两支东进，其中一支沿汉江迁到长江北的丹阳丹山（今名纪山，在湖北江陵县境）；另一支赶往长江南的武落钟离山（又名佷山，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）。

（三）丹阳巴人回迁。住在丹阳、丹山、巫山等地的后昭

族，称之为丹阳巴人。随着历史的推进，人口不断繁衍，经济不断发展，后来丹阳形成了以物易物的集市，夏王朝便把政治触角伸向那里，古丹阳也就成了奴隶制社会夏王朝的属地。由于夏王朝的蹂躏与掠夺，丹阳巴人开始另寻生路往大巴山回迁。回迁徙路线有两条：一是由大巴山之南，沿大宁河，进入陕南的镇坪、岚皋、紫阳，再进入四川的城口、万源（万源西部系古巴州辖地）；二是由大巴山之北，循秭归，越小神农山而至房县，经平利、安康而至镇巴、西乡（邻近汉中）、通江（为古汉昌辖地）。

此次回迁原因，约略有三：一者从政治角度讲，夏王朝对丹阳巴人进行了残忍的统治，如派孟涂为司神，史称“孟涂听讼”。孟涂在“蛮夷猾夏”的名义下，把许多巴人“罚为牧竖（奴隶）”流放到千里之外的米仓山一带；二者伏羲生于成纪，丹阳巴人向西迁徙本是返回老家；三者这种迁徙也是合情合理的，据《史记·夏本纪》载：“食少，调有余补不足。徙居，众民乃定，万国为治”，所以回迁乃顺理成章之事。

综前所述，远古巴山巴人，除东迁之外，留下的也日益发展壮大。向东北吗？要翻越秦岭；向西北吗？那里属氐羌，乃游牧之地，不利发展；只有向南越米仓山，才适于猎牧，宜于农耕。他们在开拓米仓道之后，许许多多的巴人，举族举家南迁，“筚路褴褛，以启山林”，进行了艰苦的创业。由于大量

的巴山巴人南迁，再加上大量回迁的丹阳巴人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，典籍上称作賁人（又叫“板楯蛮”）。到了商周时代，褒人、蜀人、郑人、秦人等，又都相继到此杂居，巴山巴人更加庞大。于是巴山巴人的中心，由北南移到了巴中地区。出于形势需要，鉴于迁徙教训，必须设险固守，对外抗御侵略，对内建立社会秩序，加之古巴州治地为梁邑奥区（即腹地），形控大小巴山，兼且米仓道又直通江州，于是便在这里建立了巴国，而汉中一带就成了巴国北部疆土。

二、古代巴中建国之考辨

要论及巴山巴国建立，必须先阐明巫山巴国（即重庆）的建立，因为旧有史料基本上是以巫山巴国而取代巴山巴国。

（一）巫山巴国（即重庆）之建立。据《水经注》云：“丹山，在丹阳南，属巴；丹山西，即巫山也”，即是说丹阳之内有丹山和巫山，所以这里的巴人称之为丹阳巴人或巫山巴人。

在新石器时代，有一支“巴、樊、覃（shěn）、相、郑”等五姓巴人，住在湖北武落、钟离山（今湖北长阳西）清江一带的赤黑两穴中，长期过着狩猎生活。进入青铜器时代，五姓共议以掷剑、划船比赛来决定，胜者为君长。后巴氏务相获胜，被拥立为君长，时称廩君。廩，表粮仓，预示君长要让族人过上好生活，让子孙昌盛。在廩君务相统领下，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灾害斗，农牧业发展，人丁兴旺，典籍称为“廩君蛮”。若

按地域论又称丹阳巴人、巫山巴人。其后，经过世代的开垦与发展，到了夏王朝时，把它纳入其统治范围（实际就是学术界公认的重庆古巴国）。

（二）古代巴中建国之佐证

第一，从上古建国情况看。在华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“人类总是由氏族而部落，而国家，由小国而大国。以华夏历史而论，也是夏有万国，殷有三千，周有八百，到战国时期才出现方千里，方三千里的大国”（《四川古代史稿》）。据《帝王世纪》载：“武王伐纣之年（公元前1046年）夏四月己卯，祀于周庙，将率之土，皆封诸侯国者400人；兄弟之国者15人；同姓之国者40人”，足见诸侯国之多。

第二，从地理位置上看。在夏王朝初，任命孟涂为巴司神，衙门设在今湖北丹阳，住在大巴山、汉中一带的巴人，必须到丹阳听讼或传递文书。此等之情，付诸实施很艰难，因为巴山到丹阳有千里之遥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那时巴中，乃梁州奥区，即腹地中心，其疆域东起通江、万源，南接宕渠水，西极西汉水之东，北到南江、汉中、城固（东）、西乡、镇巴一带，疆域很大，故有“野巴州”之称。实际上现今巴中市疆域，与之相比还少了万源西部（那时属巴叫太平乡）和汉中东部。并且，巴中处于大巴山南麓的中心，按“地理维均”道理，十分符合建国原则。

第三，从种姓信仰上看。据史籍载：巫山巴人称廩君蛮，有巴、樊、暉、相、郑五姓；賨人居住在宕渠，有罗、朴、咎（zǎn）、鄂、庚、夕、龚七姓，汉初助刘邦平定三秦有功，复其七姓不输租赋，其余的“岁出賨钱四十”，又称板楯蛮。三国时，巴西太守庞羲曾招募汉昌（巴中）賨人去攻打张鲁。賨人又与僰、蜒（即蛋，属苗瑶系统）蛮杂居，在晋代又称僚（獠），直到唐朝广明年间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賨人踪迹了。从信仰上讲，据传廩君死后，魂魄化为白虎，以虎为图腾；而居住在大巴山的板楯蛮，却是以射虎为业，图腾依旧是蛇。由此可见，习俗不同，自然有力地说明国度不同。

第四、从君长名号称谓上看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67载：“九月，巴賨夷帅朴胡、杜濩、任约，各举其众来附”。又据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》载：“魏武以巴夷杜濩、朴胡、袁约为三巴太守”。再据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载：“秦惠王并巴中（州），以巴氏賨夷为君长，世尚秦女，沿至汉代以后，賨族中仍有夷王、邑侯、邑君等称号。巴境各部族，又多泛称为巴人。但賨人活动的历史，又广为传载”。据此而明：七姓之首领称王，民称之为巴夷；余者之姓首领称賨夷侯，民称之为賨民；而這些王、侯，统称为君长。既有君长之名号，必然就有国家，理所当然。

第五、从巴渝两地建国时间不同看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

“夏后启之臣孟涂，是司神于巴”。推算出丹阳巴国（即重庆）建国时间，应在青铜器时代，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。而巴山巴国建国时间，应该是在夏末商初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和甲（即阳甲）西征，得一丹山。”商代第18位君主阳甲，本居奄地（曲阜旧城，即古奄地，亦曰商奄里），他即位第三年西征，夺得丹阳，但巴族民众大部西迁，只夺得一座空城。按此推算，山南古巴国（即巴山巴国）建立应在此之后、武丁伐巴方之前（商代共30君，武丁是第22代君主，派妇好为帅，四次伐巴），很明显，前者建国比后者建国早约700—900年。

第六、从巴中政区名称上看。唐贾耽在《四夷县道记》的巴州化成县条下云：“延昌三年（514）于大谷郡北置巴州，取古巴国为名”；《太平寰宇记》亦云：“盖取古巴国以为名”，即是说古方志，对巴中建国早有记载。

第七、从大小巴山位置方向上看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南郑县条下云：“巴岭在县（南郑）南109里，东傍汉江，与三峡相接，山南即古巴国”。《蜀水经》巴水条下云：“巴水源出南江县北之大巴山，大巴山（南）为古巴国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“此山（小巴）之南，即古之巴国”。

第八、从两个巴国求救事件上看。一是苴侯奔巴。据常璩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“周慎王五年（公元前316）蜀王伐苴侯，苴侯奔巴，巴求救于秦。秦惠文王遣张仪和司马错救苴（苴

国，今广元市昭化镇，也称葭萌）、巴，遂伐蜀，蜀灭。仪贪苴、巴之富，因取巴，执王以归，遂置巴蜀及汉中郡”；二是巴蔓子求楚平乱。据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东周末期，巴国将军蔓子求楚国出兵平息内乱，许诺以三座城池相谢。乱既平，巴蔓子不忍割让城池，“乃自刎以头授楚使”，请向楚王致歉。楚王“以上卿礼，葬其头”，巴国“亦以上卿礼葬其身”。两件求救事件均发生在东周末年，由是而知，苴求巴，巴求楚，这是两个巴国。

第九、从古巴国治所地上看。杜佑在《通典·清化郡·巴州》条下云：“巴州（今化成县），古巴国也”，从杜氏的原文、注释，都讲郡的治所在化成县。查考方志，巴中县名，除汉朝名汉昌县外，其后南北朝、隋朝，乃至唐、宋、元、明，都曾有化成县的建置，这说明古巴国都会在化成县，治所在巴州镇。

第十、从賁人作用发挥上看。一是“武丁伐巴”，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巴属四塞，唯褒斜绾毂其口”，讲商朝22代君主武丁，他派妇好四次伐巴方，主战场在褒城、汉中、南郑东面、城固西面地区。这些地区，虽为褒国属地，然与巴国犬牙交错，故此战由于褒斜谷口阻碍，妇好无获而返。二是据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“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巴师劲勇，歌舞以凌殷人，前徒倒戈”（又见《尚书》）。巴人与

庸、蜀、羌、髦、微、廬、彭、濮等都参加了牧野会战，有功于周，故周王朝建立后便以其王族姬姓分封于巴，爵之以子，自此以后古巴国便称为巴子国了。三是秦巴会盟，据《华阳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载：秦昭王奖廖仲药、何射虎、秦精等射虎勇士，并减轻巴人税负刑罚，后乃刻石为盟曰：“秦犯夷，输黄琬一双；夷犯秦，输清酒一钟”。复夷人顷田不租，即不交税。十妻不算人头税。伤人者论情而处。杀人者可僱死俵钱，即以钱赎死罪。夷人安之。可见，秦与巴作为平等国家签订友好合约。

（三）古代巴中建国历史被湮没原因

一是史料缺乏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曾经遭遇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唐末五胡乱华，致使许多典籍与文物遭到破坏。

二是地方志阙失。如宋时刘甲撰《清化前志》、元代李钧撰《清化续志》均已失传。清嘉庆由州人谢一鸣撰《巴州志稿》又未付梓，仅存道光朱锡谷撰的《巴州志》和民国六年县知事张仲孝撰的《巴中县志》两本，而且有些问题还缺乏考证。

三是地名上的混淆。在古代，有四个巴州、两个巴县，因而使许多历史事实难于分辨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和《东晋南北朝輿地考》载：其一、南北朝齐建元二年（480年），以荆州之巴东、建平二郡、益州之巴郡（治今垫江）、梁州之涪陵郡置巴州，到永明元年（483年），历时三年；其二、西魏大统

十七年(551年)，改楚州(治今重庆)为巴州，周闵帝元年(557年)，复名楚州，历时六年；其三、北齐天宝三年(552年)，置齐安(治今湖北省黄冈)为巴州，陈太建五年(573年)废，历时21年；其四、梁承圣二年(553年)，置巴陵(治今湖南省岳阳)为巴州，隋开皇九年(589年)，改为岳州，历时46年。所谓两个巴县，即明洪武九年(1376年)巴中降州为县(巴县)，正德十年(1515年)又复置为州，这样造成与重庆巴县同名达140年之久，异地同名，官师、人事、史实难于识别。

四是正统观念作怪。古代有所谓“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”之说，上古时的巴方，地处西南一隅，历来被正统观念者视为蛮夷之地，不记载于史籍；加上“诸侯恶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”(见《孟子》)。那时古巴国，属偏僻之地被视之为南蛮，自然也就不被记载于史籍。

五是在古代方国的含义上产生歧义。古代的方国，实际上又叫“方国联盟”，是商王朝时期的一种邦国与邦国之间的一种联合体。也就是说，在方国里的几个邦国名称相同，这为大帝国的统一做准备。

由于有以上原因，致使古代巴中建国历史长期淹没无闻，到了近现代，由于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后，许多学者才从“武丁伐巴方”的卜辞中，看出了一些端倪，此问题也才被有识之士所重视，使古代巴中建国历史逐渐浮出水面。他们认为，武丁

伐巴方的巴方，应是夏末商初在古巴州建立的巴国，即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里讲的“西南有巴国”，也即是地理方志书中讲的“山南古巴国”，决非重庆的那个巴国。

综合上述分析，远古巴山巴人，乃华夏人文始祖伏羲之后，为中华民族灿烂历史作出了不可泯灭的卓越贡献。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曾在巴中地域范围内建过古巴国，其建国时间大致从商代第 18 位君主阳甲伐巴起，到周慎王五年（公元前 316 年）秦灭巴蜀止，近 1000 年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四川古代史稿》、《中华五千年演义》、《四川省情》、《四川盆周》、《巴族史探微》、《巴中史话》、《巴中石窟》、《巴中县志》（新旧本）、《巴州志校注》、《通江县志》、《南江县志》、《平昌县志》、《巴中的前世今生》等。